

红色文化资源与城市公共空间协同治理的微更新探索

——以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提升规划与建设为例

□ 朱 晖, 李璐颖, 李哲林, 郑佳芬, 刘 垚

【摘要】历史文化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是近年来国家层面的重点工作,红色文化资源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与更新双重语境下,如何应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地方困境,协调红色文化传承、历史保护、城市发展三重需求是红色文化传承保护与利用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以广州中心城区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提升规划与建设为例,通过构建分级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空间体系、制定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行动方案,探索借助城市微更新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的协同治理路径,构建红色资源与公共空间治理有效协同、与城市公共资源充分统筹的长效机制,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公共服务品质提高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红色文化;公共资源;微更新;建设指引;广州

【文章编号】1006-0022(2022)12-0154-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朱晖,李璐颖,李哲林,等.红色文化资源与城市公共空间协同治理的微更新探索——以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提升规划与建设为例[J].规划师,2022(12):154-160.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n Red Culture Resource and Public Space in Micro Urban Renewal: The Case of Guangzhou Red Culture Heritage Demonstration Zone Planning/Zhu Hui, Li Luying, Li Zhelin, Zheng Jiafen, Liu Yao

【Abstract】 Red culture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is important at both national and city levels. The issues of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are critical i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With the planning of Guangzhou Red Culture Heritage Demonstration Zon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leveled spatial system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and a whole process action plan from top level design to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t explores a path for the dual improvement of red culture resource inheritance and urban public space in micro urban renewal, through which red culture resource and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are coordinated, and the visions of high quality public service and red culture preservation can be realized.

【Keywords】 Red culture, Public resource, Micro renewal, Guidance of construction, Guangzhou

0 引言

随着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红色精神的传承弘扬^①,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载体也越发受到关注。红色文化具有资源、景观、遗产三重属性,是一种集爱国主义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价值和功能于一体的独特的

综合性资源,既包含红色革命遗址、红色纪念场所等物质层面的资源(红色史迹),也包含精神层面的资源(红色精神)(图1)。

基于城市空间高品质提升的要求、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复杂的特性,新时代城市规划需要从空间治理层面提高地方适应性与可实施性。在保护与更新双重语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0YYS08)、广东省社科规划“两区专项”(GD20SQ16)

【作者简介】朱 晖,注册城乡规划师,高级工程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策划所所长。

李璐颖,注册城乡规划师,高级工程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策划所规划一部部长。

李哲林,高级工程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策划所副总工程师。

郑佳芬,工程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策划所规划师。

刘 垚,通讯作者,博士,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境下，如何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应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地方困境，协调红色文化传承、历史保护、城市发展三重需求是红色文化传承保护与利用面临的现实问题。

1 公共资源视角下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1.1 红色文化资源应与周边公共资源共同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本身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经济学中对“公共资源”的概念定义强调其开放、不设限、非排他的属性特征^[1]。公共资源一般可以被人为分割成细小的资源单位，表现为一个可以被潜在“占用者”以某种方式连续攫取、利用的动态流量；很多公共资源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有价值，一旦进行人为分割就将失去其本源价值，造成社会损失。建成环境中的文化遗产、公共空间、公共设施都可以被归为公共资源^[2-4]，提高公共资源的质量与共享性是城市规划的价值诉求^[5]。红色文化资源和其所在的城市建成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文物及其周边建筑物的安全与所在区域的风貌、道路交通环境、绿化景观品质、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息息相关，红色文化资源应与周边公共资源共同进行保护提升而不是孤立发展。

1.2 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应纳入红色文化向度

文化资源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源的引领在城市公共空间高效利用过程中不可或缺。尤其是在空间资源有限、公共空间供给不足的历史城区，亟需文化注入提升公共空间的质量。目前，文化引入公共空间通常面临地域性丧失、质量与数量有待提升、商业化主导^[6]等问题。而在目前公共投入有限的条件下，红色文化注入城市公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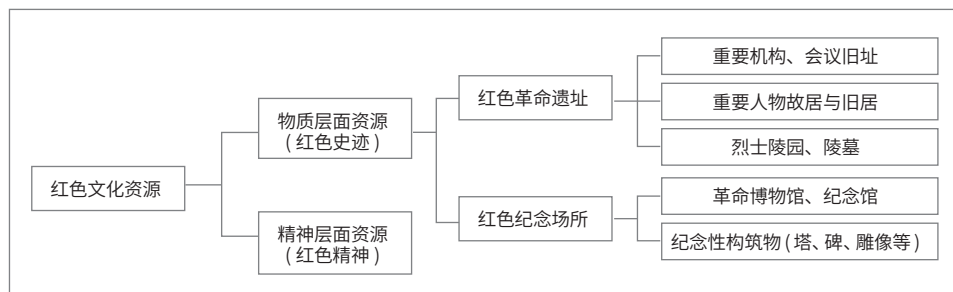


图1 红色文化资源构成

空间能够集中公共资源、有效凝聚共识、形成公共部门的强介入。

1.3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公共空间治理的协同作用

公共空间治理存在需求匹配难、资金持续难、利益协调难的问题^[7]，面临公共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困境^[8-10]，即在特定场景中多主体共同使用公共资源，若无合理的供给制度，必将导致环境退化乃至资源枯竭。为化解“公地悲剧”，各国社会实践产生了私有产权（市场）治理、自治治理、网络治理、国家治理等五种主流公共资源治理模式^[11-13]。

从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公共资源视角来看，公共资源治理的本质是使资源系统的流量最大化，同时又不损害资源系统本身^[14]。基于此，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有机协同，在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能的同时又能有效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特殊的公共资源，在历史保护与城市微更新双重语境下，可以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重要文化触媒，通过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方式，探索红色资源与公共资源统筹的城市微更新路径。

2 研究区域概况

为系统性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响应广东省提出的“建设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的工作要求，广州以越秀区为主体启动了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的规划建设，通过城市建设对红色文化进

行传承弘扬。

2.1 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特征

广州红色文化融合了岭南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为变革图强、挺立潮头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兼容并蓄、破旧立新的务实求真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鲜活的当代价值。在广州11个行政区中，越秀区是红色史迹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区内红色史迹资源占全市的21.7%，其中已明确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1处，占全市的27%，按照历史功能可分为名人旧居、革命会址、革命旧址和纪念场所（图2）。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制度较为成熟，主要通过建设管控的方式对街区和建筑实施严格保护。同时，广州各类保护建筑产权私有比例较高、活化动力强，由此相关政策理念由静态保护转变为鼓励历史资源适应性更新活化。近年来，广州日益重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在城市更新防止大拆大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政策要求下（表1），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与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广州完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促进历史城区活化振兴的重要课题。

2.2 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困境

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既面临遗产保护的共性问题，又面临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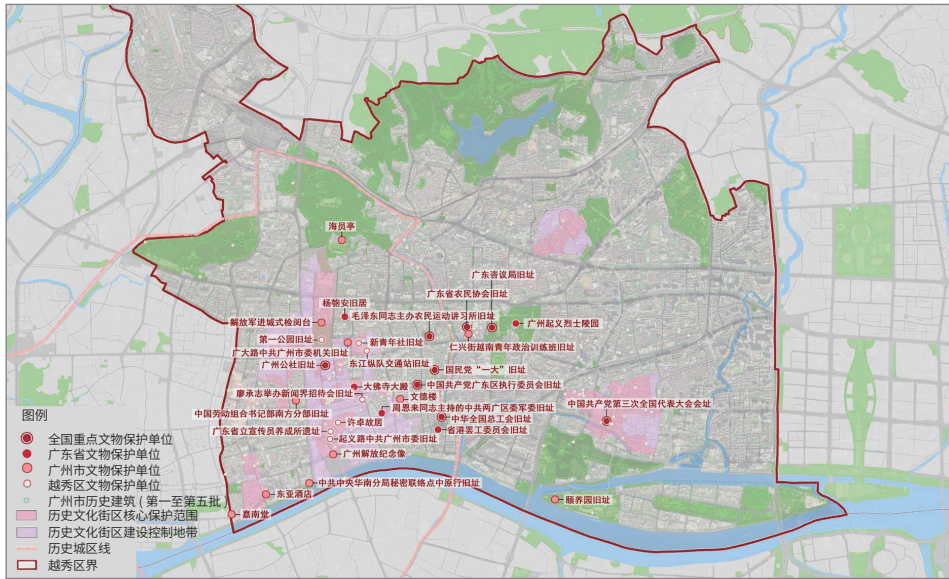


图2 广州越秀区红色史迹(不可移动文物)分布

表1 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层面历史文化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的相关文件

时间	相关政策文件
2018年7月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
2019年1月	《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
2019年8月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越秀区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9年10月	《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
2020年1月	《广州市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分工方案》
2020年1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若干措施》
2021年4月	《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越秀片区)发展规划》
2021年8月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2021年9月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2022年3月	《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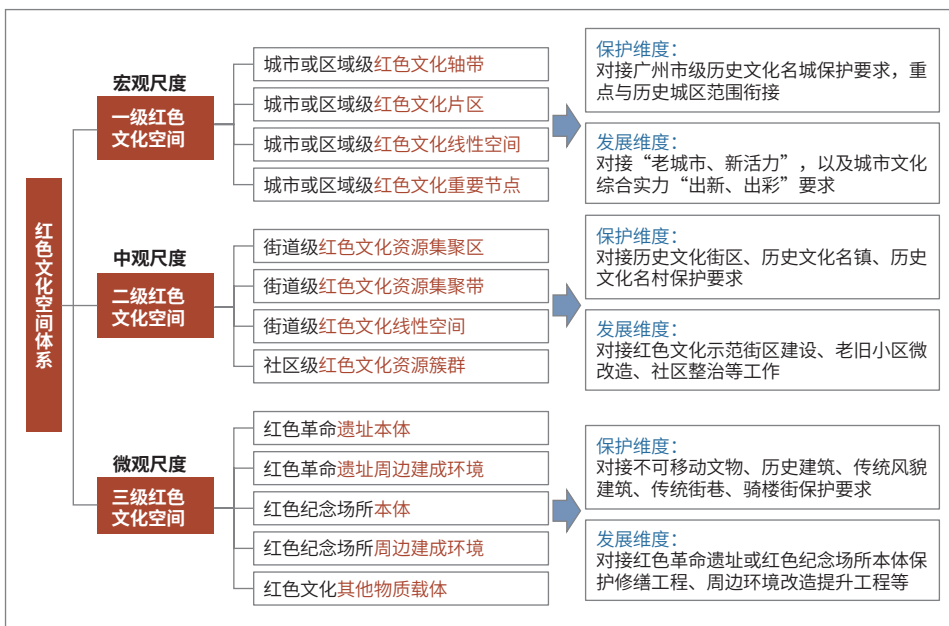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层级红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特殊的困境。首先是红色史迹散点式分布,缺乏整体统筹;其次是红色史迹埋没于广府市井街巷,宣传力度欠佳;最后是部分红色史迹保护利用情况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不匹配。

在建筑本体方面,如越秀区31处红色史迹(不可移动文物)中,近一半的文物建筑外立面、建筑内部需要进行整饰修缮和维护,约2/3的文物因私人产权等多方面因素,在对公众开放力度、展示及活化利用等方面有待加强。

在周边环境方面,由于广州的红色资源大多集聚于历史城区,其周边公共空间在环境风貌、设施、景观等方面都存在老城区的共性问题。红色革命遗址周边的建筑普遍存在建筑风貌不协调、外立面老旧、顶层加改建、架空线杂乱等问题;周边道路普遍存在路面破损、停车设施不足、机动车及共享单车乱停放、城市家具及绿化杂乱等问题,区域环境有待整体提升。

2.3 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与提升探索

从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特征和困境出发,基于公共资源的有效维护与利用,广州探寻红色文化传承与公共空间治理的协同路径。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公共空间治理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尽管通过渐进式微更新可以实现两者的改善、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目前鲜有研究与实践将两者结合进行资源辨识、评估、分类以及施策引导。

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规划与提升工作在理念、方法、策略层面探索了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的协同治理:一是提出“红色文化空间”概念,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历史名城保护体系衔接;二是通过厘清红色文化资源与周边公共资源的联动关系,构建红色文化空间发展格局;三是提出渐进式微更新施策指引,通过节点详细设计探索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触媒的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路径；四是探索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3 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充分协同的规划路径

使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成为历史城区活化的重要文化触媒、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的有效途径，建立包括红色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红色文化空间体系，探索红色文化空间与公共空间协同治理的城市微更新路径，是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与提升规划的主要目标。

3.1 基于系统性整合的红色文化空间体系构建

3.1.1 与各层级保护与发展要求充分整合

广州将红色文化资源及其周边建成环境进行整合，统筹归为红色文化空间，紧密衔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与各层级保护要求，强调与既有保护政策、规划、建设计划、发展战略相协调，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构建各有侧重的保护利用方式(图3)。

城市层面的红色文化轴带、片区等应对接广州市级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要求，强调发展式保护利用；中观尺度的街道、社区层面的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区、集聚带、线性空间、族群等应对接历史文化街区与名镇名村保护要求，提倡共生式保护利用；微观尺度的红色革命遗址、纪念场所及其周边建成环境，以及红色文化其他物质载体等应对接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传统街巷保护要求，实施原真性保护利用(图4)。

3.1.2 结合人们需求，与建成环境公共资源相统筹

提出“红色+”规划理念，以文化价值为导向将红色资源与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公共资源充分统筹，促使红色文化、

历史保护、城市发展“三融合”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遥感影像与POI数据辨识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厘清历史文化资源与周边公共资源的联动关系^[15-16]。首先，通过遥感图像识别广州越秀区水体、绿地等公共空间；收集历史文化保护规划资料，提取越秀区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分析百度POI数据，提取越秀区公共交通数据(轨道交通站点及线路、公交站点及线路)、文化产业数据(设计、广告、传媒、文化创意等公司企业)、文化设施资源数据(展览馆、博物馆、科教文化场所等)、生活服务资源数据(餐饮、购物、生活休闲等)。其次，建立覆盖越秀区范围的100m×100m网格，结合缓冲区、核密度分析等，对各类空间要素进行网格化分析及可视化表达，分析各类要素的空间布局情况，再通过要素聚类、叠加分析等，分析红色文化资源与城市生活功能、文化发展格局、历史保护格局的空间关系，识别具

有发展潜力的红色文化空间(图5)，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极两纵三横三片区”的空间格局^②，划定15个红色革命遗址提升片区，提出各个提升片区的保护利用建议。

探索以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创造高品质公共服务的广州样本，近期考虑“惠居民、惠在地、惠当下”，满足居民当下日常生活需求，开展建筑修缮、街巷修复、设施补短板、联动老旧小区进行微改造等工作；远期谋划“惠市民、惠周边、惠长远”，未来可与市级层面的文商旅融合发展，惠及湾区更广泛受众，建设红色主题步行路径，优化城市重要公共空间、策划城市文化活动、激活文化产业。

3.1.3 基于公共空间要素的红色文化空间建设指引

在严控文物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叠加各级保护对象及保护范围等历史保护要素，对各类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及其周边环境的优化提升进行规划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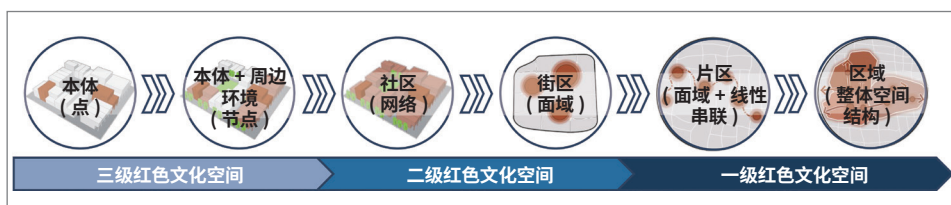


图4 保护与发展双维度下的三级红色文化空间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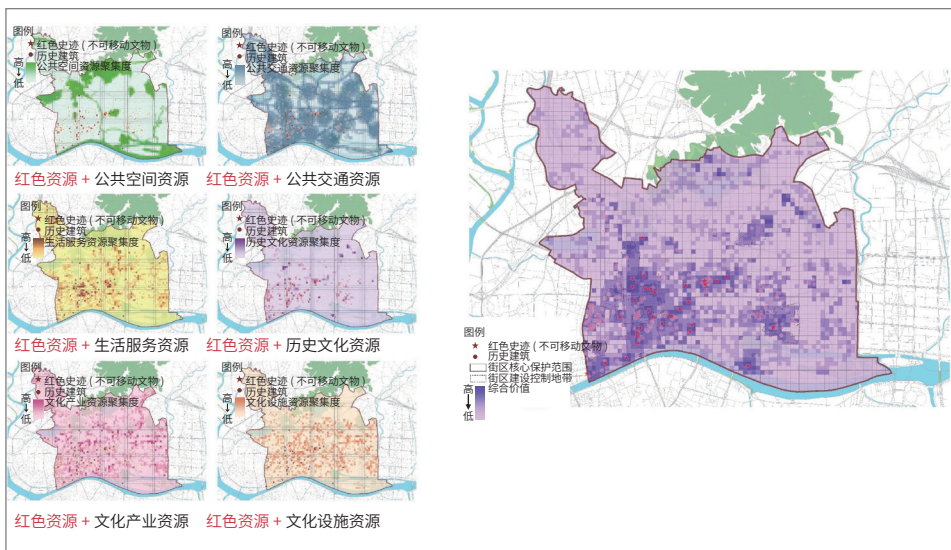


图5 红色文化空间与各类公共资源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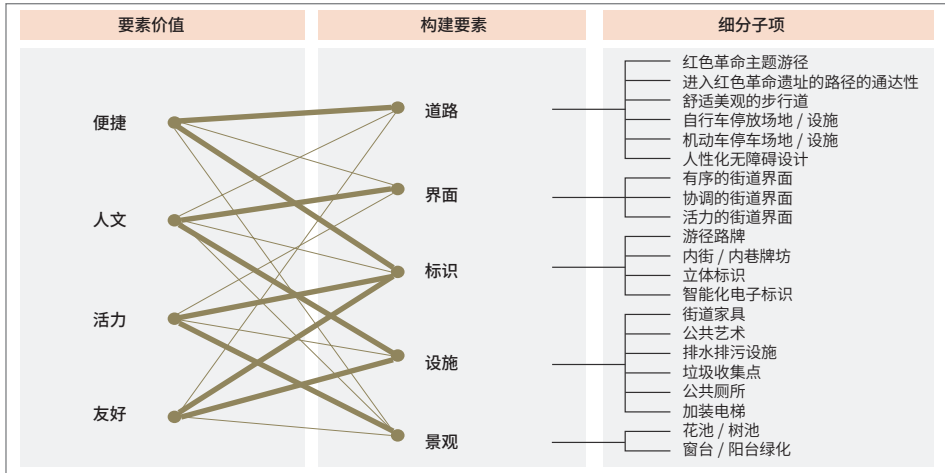


图6 红色文化空间优化指引

持续管养类 公共价值高、现状利用好	近期重点提升类 公共价值高、现状利用差	中期提升类 现状利用差、活化条件好	远期提升类 现状利用差、活化条件一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依据文物日常保养维护制度开展文物日常巡查,做好日常保养维护工作 充分利用新技术,逐步提升展览、展示水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文物本体修缮 周边环境整体品质化提升 推动历史价值展示,最大限度挖掘文物价值,面向社会开放 私有产权或混合产权的文物先启动产权转移工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梳理权属,有条件的进行产权转移,将文物所有权收归公有 文物本体修缮,改善使用条件 周边环境整体品质化提升 延续原有使用功能或置入适当的当代功能,提高开放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逐步协调权属,远期收归公有 周边环境整体品质化提升 落实文物日常保养维护工作 依托现状使用功能,串联周边红色革命遗址线路,加强宣传,举办特色主题活动

图7 基于公共价值的红色革命遗址分类



图8 红色文化空间提升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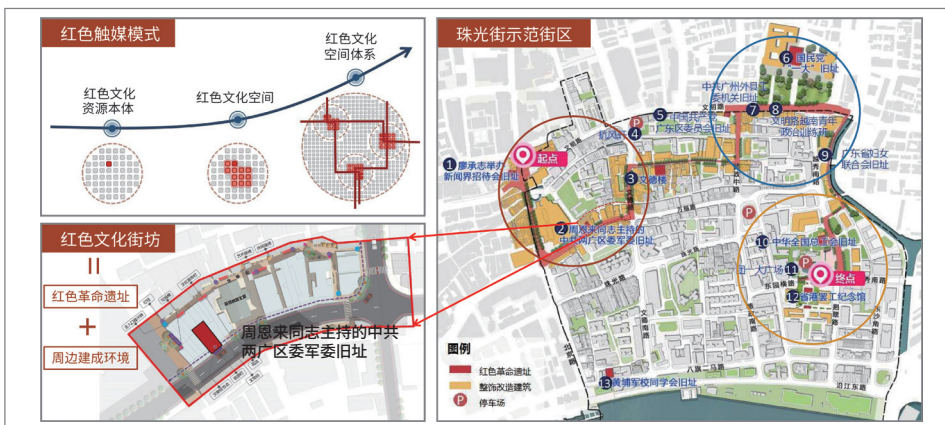


图9 红色文化资源带动城市微更新示意图

指引。根据扬·盖尔的公共空间五要素和包容性、活力性、安全性、宜人性及识别性的解读^[17],将公共空间解构为道路、界面、标识、设施、景观五类感知要素,基于便捷、人文、活力、友好的建成环境公共价值,对红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更新融合建设进行指引(图6)。

3.2 以红色文化资源触发渐进式城市微更新

3.2.1 红色文化资源触媒元素及其利用策略

红色革命遗址是红色文化最直观的存在形式,其保护提升的主要行动为“明产权、活功能、修本体”。对于状况良好、功能适宜的红色革命遗址,应予以保留和维护,形成最贴近当地生活和最真实的红色文化资源展示窗口;对于现状保护不利、使用不当的红色革命遗址,可进行功能重置与内外修缮整饰,改造活化并置入文化、展览等功能,使其成为产生社会交往、举办活动的场所,提升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对于红色革命遗址周边环境,通过疏通街巷、建立标识导览系统、美化空间环境等,提升历史城区公共空间的品质。

3.2.2 基于红色文化资源公共性特征分类施策引导

在遗产自身价值、现状功能、利用条件等遗产再利用价值因素的基础上^[18-19],加入产权属性、政府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已有保护更新投入等反映公共介入程度的因素,建立基于公共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以实现分类施策引导,保障政府主导的网络化协同治理实施。

根据资料收集及现场调研,获取文物本体价值、历史价值、权属状况、现状功能、历史功能、公共投入情况、区位特征等信息,对文物及周边环境进行评价,将红色革命遗址分为持续管养类、近期重点提升类、中期提升类、远期提升类,并形成红色革命遗址本体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的分期实施计划(图7)。

3.2.3 公共空间与红色文化结合带动城市微更新

构建与公共空间有机结合的红色文化空间体系和整体格局，通过“修本体、优风貌、提路径、设标识、连片区”，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本体—红色文化空间—红色文化空间体系的触媒模式（图8），将红色文化精神融入公共空间，进行红色文化示范节点详细设计，引导本体修缮及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实现街巷修复、功能活化、设施提升、“引径活片”，使红色记忆活化为公共空间营建、品质提升的触媒，为城市场所注入红色精神（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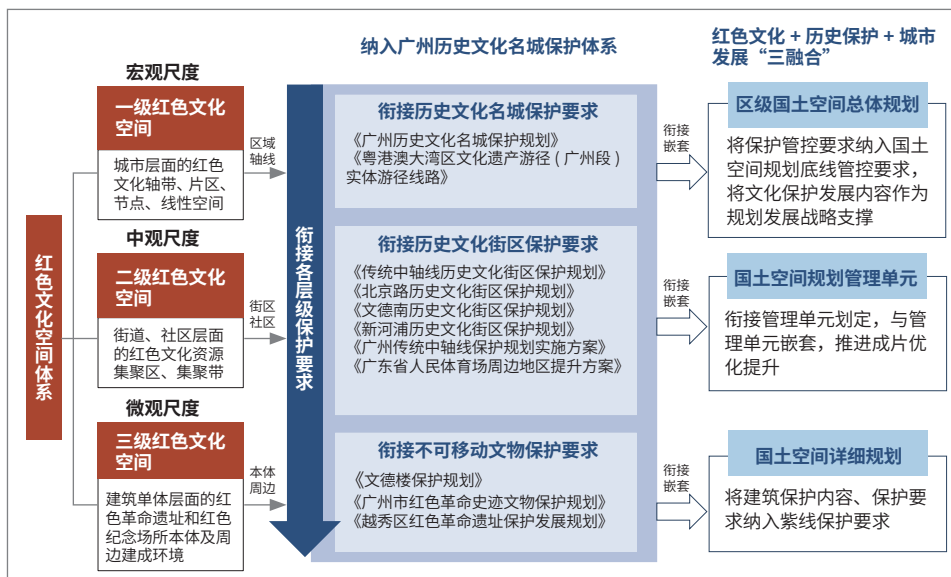


图 10 红色文化空间体系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衔接

3.3 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3.3.1 丰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将红色空间保护与发展纳入常态化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衔接规划编制与管理体制（图10），一方面加大整体规划保护力度，严控保护底线；另一方面加大整体资源利用强度，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将相关工作纳入各类保护规划及实施方案。

3.3.2 制定渐进式行动计划

红色文化示范区的规划建设应精准获取信息、融入社区、打破一次性规划。构建红色文化资源“一张图”基础数据库，对其中的红色文化资源编制包括基础信息、保护范围、本体及使用情况分析、周边环境分析等内容的保护图则，为后续规划设计与项目建设打好基础。同时，制定渐进式行动计划，形成红色革命遗址本体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的近期、中期、远期项目库和项目地图。

3.3.3 文化介入激发资源活化

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文化产业和文化设施双重属性。区别于以往拆除重建的方式和常规的城市微更新，文化触媒的公共空间提升与公共资源整合不仅包括空间整治修复，还包括基于红色文化资源专题研究成果，与公共空间结合进行红色文化展览、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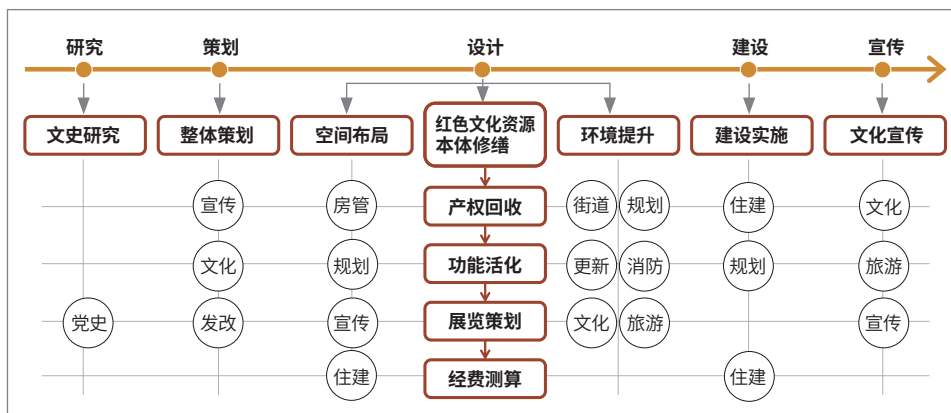


图 11 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工作方式

题文化活动策划，集聚多方资源，鼓励自发更新^[20]。获取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和公众等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持，激发当地居民、商业经营者更新改造的主动性，开展文化创意相关的展览、演出等活动，激发历史城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潜力。

3.3.4 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方式

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始终面临投资主体缺乏与管理主体缺位的公共资源供给与运营的核心问题。从公共资源治理的视角出发，以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方式，横向贯穿研究、策划、设计、建设、宣传工作板块，纵向深入产权、功能、策展等工作链条，动态协同宣传、文化、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以及相关

利益主体，联动开展老旧小区微改造、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等试点工作（图11）。

4 结语

公共空间是社会资源配置、公私利益博弈和空间事务集中的“糅合体”，是城乡规划可以进行积极干预的关键领域^[21]，而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公共资源治理视角为探索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有效思路。广州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保护提升规划与建设工作通过红色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的协同治理，构

建了系统的红色文化空间体系，探索了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触媒进行渐进式城市微更新的路径，形成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公共空间治理结合的长效机制。目前，广州推动了超过10处的红色革命遗址完成本体修缮和周边环境提升工作，打造了一批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场所与公共空间，如新河浦地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以及东园广场、海珠广场、起义路等重要红色文化空间的改造建设等。

公共资源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实现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需要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触媒的政府主导下的网络化治理微更新，是资源永续利用和公益增进的可行路径，最终将实现“红色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红色资源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历史城区活化动力、公共空间介入方式、街区惠民手段，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城市公共服务高品质提升的双赢。■

[注 释]

-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指导文件；201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革命文物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2022年3月1日，《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 ②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越秀片区)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塑造“一极两纵三横三片区”开发格局，突出中共三大会址的极点带动作用，强化两条纵轴线(近代传统中轴线、古代传统中轴线)和三条横轴线(中山路轴线、东华东—文明路轴线、沿江路轴线)的连接，打造“红色文创旅游融合发展区”“红色文化研学体育融合发展区”“红色文化商贸旅游融合发展区”三大片区。

[参考文献]

- [1] 孙波. 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研究的进展和评述[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59-64.
- [2] 侯君, 陈汉云, 孟庆贺, 等. 香港发展权转移保护私人历史建筑的多维度解析及优化策略[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2): 129-136.
- [3] 魏璐瑶, 陆玉麒, 靳诚.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J]. 地理研究, 2021(10): 2707-2721.
- [4] 徐苗, 彭坤焘, 杨震. 地方公共资源与契约社区——多中心治理理论下的门禁社区研究[J]. 城市规划, 2018(12): 67-75.
- [5] 秦红岭. 共享与善治: 未来城市规划的价值诉求[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4): 89-97.
- [6] 廖晓明, 周芯如.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J]. 长白学刊, 2022(2): 148-156.
- [7] 吴志强, 王凯, 陈韦, 等. “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创新思考”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3): 1-14.
- [8]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 1243-1248.
- [9] 胡舒扬, 赵丽江. 新制度供给与公共资源治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分析[J]. 学习与实践, 2015(10): 53-60.
- [10] 黄玖菊, 林雄斌, 杨家文, 等. 城市公共空间“公地悲剧”治理: 以共享单车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5): 93-101.
- [11] Robert J S. Resolv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Crea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Wildlife[J]. CATO Journal, 1981(2): 439-468.
- [12] Dedeurwaerdere T. The Contribut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Les séminaires de l'Idrri, 2005, 13: 1-15.
- [13] Hardin G. Poli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eserving our Common Heritage[J]. Wildlife and America, 1978: 314.
- [14]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alua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5] 魏伟, 刘畅, 张帅权, 等. 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J]. 国际城市

规划, 2020(3): 77-86, 118.

- [16] 魏伟, 洪梦谣, 周婕, 等. “城市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评估方法——以武汉市为例[J]. 城市规划, 2020(10): 71-80.
- [17] Gehl J.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Sixth Edition[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2011.
- [18] 凡来, 张大玉. 北京: 大数据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旅游价值量化评价研究[J]. 北京规划建设, 2022(2): 66-71.
- [19] 雷泽鑫, 罗俊杰, 曹磊. 基于AHP-GIS的历史性城市景观价值评估量化研究——以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例[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21(4): 630-637.
- [20] 苏洪恩. 以城市策展为触媒的历史城区更新活化方法——以北京大栅栏和深圳南头古城为例[J]. 装饰, 2018(4): 132-133.
- [21] 杨超. 城市治理视角下的公共空间规划模式与方法探索——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4): 2, 44-45, 93-101.

[收稿日期] 2022-07-31